

的陰影下迂迴不前，社會生活又邁入後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富裕」時代，具體地結合現實，提出文化／意識形態批判，總比因循、慣性、墨守成規、例行公事地搞些什麼中國週、認中關社、探貧問苦應世得多。

在知識界裏，中國問題近年是少談了，原因可能很多，我看是索然無味，一言難盡。似乎依然興緻勃勃，堅持己見的只有托派，或者是方丹、許行一些「觀察家」的展望，和身在香港、心屬中華的「黃河」。儘管他們的文章，不外是針對中國政治時事各抒己見，各展批評，和聲援／報道國內民主運動／造反派／異議者的行動／動向，理論架構始終沒有突破近幾年來的規範，可是，面對中共海內外龐大的宣傳／意識形態機器的大合唱，他們的小調畢竟悅耳動聽和輕快可愛。

因此，我總以為，中國問題不談無壞，要談就要「不識大體」，反其「道」而行。「學苑」今屆出了兩期，內容都以文化批判／分析為主，奇怪社論卻堂而皇之，大談中國問題，惹人注目。可惜，令人遺憾的是，「學苑」社論談的中國問題，不但新意不大，可憐意識形態上，又倒退回擁護建制，維持現狀的統治意識形態去。

「學苑」第一期社論主張「正確評價文革和毛澤東」，指出一個傾向（實用主義／經驗主義）掩蓋另外一個傾向（理想主義／唯心主義）的危險性，不能說完全錯誤。但是，如果只是提出一個空泛／一般的評價態度（公正、開放）和分析方法（全面、歷史），沒有正面的批判，或者嚴格區分與官僚統治階層其中一派的意識形態的差別，我實在看不出這篇社論有什麼積極性的意義。

不管什麼立場，稍對當代中國政治有點認識的人，都不能否認中共統治集團內都從來都存在着一分為二的矛盾，「四人幫」倒台之後，這個情況也沒有改變。用「兩條路線的鬥爭」去理解也好，用「派系鬥爭」去理解也好，要點都是一樣，矛盾仍然存在，只不過現階段是對立的統一。問題的關鍵在於，即使社會地位相同，統治階級對理解／改變社會現實，依然可以有所分歧，從而達到策略上的差別。就拿評價毛澤東的問題來說，鄧小平、陳雲一類的實用主義者顯然就和汪東興、陳錫聯一系的理想主義（膜拜）者（？）不盡相同（華國鋒只是一個毫無主見，投機成性的政治茄哩啡）。如果要發展國民經濟，推行所謂四個現代化，就必須打破毛澤東思想體系中理想主義的一些教條，否則對全面倒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其他趕資追修的一連串急劇政策轉變就很難自圓其說；然而，假若完全徹底打倒毛

澤東思想，中共的統治也就失去了意識形態基礎，等於自掘墳墓。故此，中共現階段全面批判毛澤東是不會出現的，除非四化失敗，政治宣傳需要一隻代罪羔羊，毛澤東才有可能落得史太林的下場。明乎此，就不難明白鄧小平為什麼仍然會漂亮地說要全面理解、繼承毛澤東思想，鎮壓民主言論之時，也不忘提出毛澤東思想是四項必須堅持的原則之一；可是，我們更應該不要忘記，毛澤東也曾經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

第二篇社論「『北京之春』不是陰謀」更加離譜，簡直是落井下石，喪失人民立場。「四人幫」倒台以來在北京自發而蔓延至全國各大城市的民主／人權運動，雖然被外國評論視為「布拉格之春」的中國翻版，卻是文革以來人民運動的延續。從外電及各類雜誌的資料報道，北京民主牆和各省市大字報的內容和傾向是多方面的，我不懷疑右傾的思想也有存在，但了解到文革以來中共當權者令人窒息的壓抑，人民思想在「反動」（REACTON）下就算走向另一個極端亦情有可原，何況造反派在混亂中並沒有喪失立場，在緊要關頭（鄧小平公開抨擊民主運動），矛頭更直指政權的壓迫本質。這一種生命攸關的意識形態鬥爭，與在香港業餘式的文化批判，實在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學苑」的輕率評論，就更不可原諒。

「學苑」的論點是怪誕荒謬的，一口咬定四個現代化和政治民主要求不可相容，以為在目前中國低下的政治水平，要推動經濟發展，就無可避免要中央集權，因此個人的自由民主要求，實不能相符集體利益。儘管在回答李永達和尹國華的大字報中，「學苑」總編吳俊雄一再強調對四個現代化有所保留，只不過認為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本質上是相互矛盾的，但「學苑」社論的客觀社會實際效用（請參攷你們熟悉的意識形態理論）無疑是倒向當權派的。

無錯，我同意四個現代化與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毫不相干，它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概念，意味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先進」／「發展」的社會典範，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大多是被世界資本壓迫和剝削的國家）都已「落後」／「未發展」，最多只是在「發展中」的社會。走向現代化，就成為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換句話說，資本主義是唯一的道路。中共大事吹噓四個現代化，既反映出其社會主義發展理論基礎薄弱，也暴露了領導階層的意識形態傾向。不過，人民羣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乘着四個現代化提出第五個現代化——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意義卻大不相同。這個鬥爭口號，是深思熟慮、反覆教訓的歷

史經驗成果，絕不能簡單一句「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就可以輕輕抹殺。事實上，人民羣衆鬥爭由政治性轉化為意識形態性（這裏是指傾向和比重而言，其實意識形態鬥爭根本就是政治性的）剛好也是中國當前社會歷史結合點的產物。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文革的大規模行動現時已經不可能，意識形態鬥爭就上升成為主導。政治民主的基礎是經濟民主，反過來也是保證社會主義正常發展的最佳武器。怎麼樣的模式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理想典範，目前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富於爭論性的命題，不可一概而論，然而人民羣衆在各個層面（社會、經濟、政治）的民主參予無論如何是必須考慮和必要的條件。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很大的教訓，使我們對認識／討論中國問題也起了一個很大的轉向——中國政治前途的掌握和理解，只能從人民運動發展的角度出發才能得到較為完滿的答案。文革並沒有完結，鬥爭將會繼續下去，但是中國人民已不再是愚不可及，因為他們已經認識到，只有通過曲折艱辛的鬥爭，才能爭取／保障美好的將來。

香港學生在認識中國的問題上也是轉折的，大抵七十年代以前的心態是恐懼，鈞運以來是盲目膜拜，今天應該是清醒過來，進行科學批判的時候了。「國粹派」過去的最大缺點是把中國一切不合理的政策／現象都合理化（JUSTIFY）過來，成為官僚集團的辯護士。「學苑」雖然在「國粹派」的屍骸中站立起來，思想獨立自主，但心態不自覺地卻依然停留在過去的時代，其情可憫，其志不可嘉，作為學生界一份較為特出／出色的刊物，實不應淪為如市面一些無聊統戰刊物的應聲蟲，本人草草為文，謹代表中國人民致以莫大的遺憾。

文化新潮 歡

迎一切對國內、台灣及香港期刊作出評論的文章。

來稿必需有理論及事實支持，一經刊登，贈閱本刊半年。